

閱讀推介

編輯室

中華神學之道

作者：梁燕城

出版者：文化更新研究中心（香港）

出版日期：2024 年 1 月

《中華神學之道》序論 從中國文化到中華神學

我出生在香港，六歲時在陽台放風箏，看到夕陽西下，然後天上星星出來的時候，我哥哥問了媽媽一個問題，坐火箭飛到天空什麼時候才到盡頭，媽媽說是沒有盡頭的。那是我第一次啓蒙，想到什麼叫沒有盡頭，什麼叫無限？然後跟著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，突然就想到，如果這一切萬物未存之先，究竟「無」是什麼？如果宇宙有個起源，起源之前是什麼樣子？我那時候進入一種虛無飄渺的體驗，但也很釋放快樂，一種思想上的滿足。

十歲時爸爸因國內三年自然災難，憂國憂民，產生思覺失調症，變成很可怕的人，天天不工作在家抽菸罵人，當最需要父親的形像去崇拜時，我失去了父親，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體會什麼叫痛苦。由於這些經歷，我很快去追求宇宙人生的答案，所以十三歲我就買了《莊子》和《老子》來看。

十四歲初中三時，由於遇到一個讀西方文學的英語老師，他講莎士比亞和西方文學，又引起我對西方文化的興趣，我先讀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、但丁的《神曲》，很喜歡王爾德(Oscar Wilde)的唯美主義(aestheticism)，然後讀西洋哲學史，看柏拉圖、尼采、笛卡兒，還有存在主義。

到十五歲開始看佛學的書，最先看日本佛學大師木村泰賢的《人生的解脫與佛教思想》及《原始佛教思想論》，知佛教是追求解脫痛苦的，遂對佛教產生了興趣，不但研讀，且實踐打坐，尋求解脫得道。讀《因是子靜坐法》，靜修呼吸而入定，這是我早期人生裡面一個關鍵的變化。在打坐入定期間我領悟萬象因緣起滅的境界。到十七歲的時候，我用虛靜心觀天地，忽然領悟天地萬物都依循無所不在的大道，每一物都有其道路規律，這是易學的思想，萬有變易中有不易之道。

到了十八歲，開始產生對國家民族重建的理想，看到中國近代史很悲慘，希望中國富強，先是讀梁漱溟的書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，發現中國儒家文化的價值，是重人性及人的生命，然後看唐君毅寫的書，對中西文化比較更為深入，所以我就迷上唐君毅所展示的宇宙人生及中國智慧。

大一暑假隨大學團去台灣，在阿里山觀玉山日出，旭日從遠山雲彩中升起，突然體會我跟天地同為一體，我在宇宙內，宇宙在我內，融為一體。心中湧出大慈悲仁愛，視天地衆生與我生命連結為一，一時證悟宋儒程明道「仁者與天地萬物渾然成為一體」的體驗，同時也證悟佛家的「同體大悲」。

十五歲到二十二歲的三重領悟，第一是體悟佛學所描述的變幻無常、因緣起滅，萬法皆空；第二體悟是道家與易學所描述的變化中有不變天理、道通為一；第三體悟是儒家所描述的仁愛良知，天人合一。而後卻由儒家之內在超越，走向了上帝。

儒學核心是人有普遍美善之心性，以仁愛正義為本體。儒學又以人的仁愛是從天而來，與宇宙同一本體。人性的仁愛來自天，則天的本性應是仁愛，如果天是仁愛的，天應該是有性情的，孟子也說「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」，順人之情而出，就是善，故善必連著性情。如果天有性情，我由儒家作深層反省，慢慢移向接受一個有仁愛性情的天，而與上帝的理念接近。讀中國書經與詩經，發現中國古聖人祭祀上帝，而成後來祭天儀式。

我原是想隨儒家修養學做聖賢，但是我發現良知的真誠惻怛呈現是真實的，不過不能長存不息，達到三月不違仁，人心中也有男女情欲、貪婪驕傲、自我中心，時會波濤洶湧，這是人內在善於實存上常會扭曲，而有所陷溺。修養淺的人，往往一有領受就以為已成聖成佛，修養深的人卻更知成聖不易。

這個時候聽唐君毅講倫理學，講到基督教倫理學的核心是人陷在罪的隔絕中，人跟上帝斷了關係，而後與天、地、人隔絕，困於自我中心。耶穌基督釘死十字架，承擔人類罪的刑罰，寬恕和釋放所有人，上帝既寬恕人類的罪，人也應該彼此寬恕。唐先生一言驚醒，罪的描述如當頭棒喝，當經歷人性中的「罪」，即明白為何千百年來人類不肯跟從聖賢或覺者的道路？人類歷史為何如此殘暴？現實上人為何如此自私和虛偽？都是因為「罪」。

那時我就把《新約聖經》從「羅馬書」開始讀，一直讀到「啓示錄」，結果羅馬書第七章裡描述罪的問題很清楚，保羅說：「我也知道，在我裡頭，就是我肉體之中，沒有良善。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」，我就開始知道，基督教是何等精深揭示人的陰暗面，基督信仰在對付人類最難的問題，就是罪的真實性。讀「加拉太書」更清楚，耶穌基督通過釘死與復活，完成對罪的潔淨與人心靈的救贖。

我在中文大學認識一個基督徒同學，也讀很多哲學與中國文化的書，成為好朋友。他邀請我去他們的教會青年團契，在那裡遇到很多基督徒大學生，我用儒道佛、印度教與西方哲學問各方面問題，信徒們都不懂回答，但我發現這些人有一點令人驚異的，就是他們能夠跟上帝感通，這恰恰就是我从修煉不能達到的。他們很多是香港殖民地教育讀英語出來的，不懂中國歷史文化，但有一種通到上帝的喜樂，他們禱告是真的在與上帝溝通，不是表面的儀式。

我就自己求問上帝，像孔子一樣禱於天，問究竟是一切宗教殊途同歸，還是耶穌基督是通上帝的道路，在這個時候我就感到一種臨在的啓示，明白跟從神的生命是屬靈性的，通上帝之路是一窄門。跟從人的宗教與哲理，是屬世界的人文價值，不同於救贖之道。救贖的生命與人間哲理，屬靈與人文價值，分屬不同層次的義理，不必衝突。於是開始從信心接受，由基督去感通上帝。

稍後我決定獻身，完全放下了學問修養，獻出一生給上帝，一時心中自我圍墻溶解，虛通無礙，實時體會聖靈榮光，如活水洶湧進入生命，上帝向我呈現其神聖世界，流入現實的我心，這成為我人生另外一個大領悟。不久後，上帝卻交付我一個使命，放下一切，成為一個僕人，獻身給中國人民，一生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建奮鬥。

八十年代初，蔡仁厚與周聯華兩人是中國新儒學與基督教的重要人物，新儒學掌門大弟子蔡仁厚對基督教提出的八大焦點問題，周聯華從西方神學回答，但和蔡仁厚並沒有真正對上了話，基本上是各講各話。當時我仍在跟隨成中英讀博士，但敢於與這些大學者進行對話，因自認為我從十八歲與唐君毅老師會面，在新儒學大師門下已十三年，也讀了基督教神學，思考從中國思維方法消化基督教也有八年，已摸索了一條會通和對話的道路。在夏威夷期間，一九八四年我寫了《會通與轉化》一書，回答蔡仁厚對基督教提出的問題，提出自己年青一代的新思考，我在《會通與轉化》中的觀點，也成為一個經典性的中華神學反省。這書中的中華神學思路，成為以後我從事的文化中國運動和文化更新工作的思想基礎，擺脫了西方神學的框架套路。

除了《會通與轉化》的神學反省外，我在二十六歲構思《慧境神遊》時，是由中國哲學的佛道儒境界為起點，一步步以不同境界的層次，上溯到上帝呈現的境界，基本上是由哲學一步步走入神學。從多重境界去理解人生，我分成六重境界，第一層次是生活的世界，第二境界是覺悟空性，體悟緣空和無常變化。第三境界是體悟道通為一，道是宇宙萬化變中的不變法則，也是天地之根源。第四境界是體證人心性來自天，人性本體是仁愛。然後第五境界證驗天之無限，是隱含性情的真理本體，然後到第六境界是上帝的主動的呈現和啓示。這是從唐君毅境界哲學的思路入手，到發展成境界神學。

過了好多年之後，我將《慧境神遊》的思路，寫了一本書叫《中國哲學的重構》，通過境界哲學來講中國哲學，然後從境界哲學裡面講到神學。從境界怎麼講神學，講到上帝存在及啓示的可能，就沒講上去了，因為講基督教方面我覺得功力還不夠，就沒有再寫了，要到十多年後寫《八福的沉思》，用八福講靈修的八重境界，才完成境界神學。

中國剛開放時，回國看到那時發展十分艱苦，文化衰靡，為了重建祖國的文化靈魂，遂在海外發動一個救國運動，可以說是救文化精神的運動感到是上帝交付的使命，在海外成立了「文化更新研究中心」。我們認為要救中國，要先救文化，救自古以來的智能與精神價值。在溫哥華我和三十個有心人分享中國的遠象，每人捐一百加元(六百多人民幣)，用三千塊加元(約二萬人民幣)開辦籌款晚會，想不到各方反應熱烈，籌到六萬加元(近四十萬人民幣)，就創辦了學術季刊《文化中國》。辦刊物是很艱難的，原想把錢用完了就不辦了，但沒想到我在海外教會到處

去宣講以基督信仰關愛中國人，以新時代中國文化重建中國人的骨氣與尊嚴，及建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共融之道，得到了海外華人的認同和支持，所以一做就做了三十年，《文化中國》也出了超過一百期。那時，我真感到神蹟出現了。剛開始使命時，香港商業電台與我聯絡，請我回港主持早晨重點時事評論工作，年薪一百二十萬港幣，這是高薪的工作機會，但我想，當時四十二歲，人生下半場是為了祖國重建，還是為了高薪厚職。最後還是選擇了神聖之路，我放棄了這機會，甘心拿最低的薪酬生活，目的是去服侍中國人。

2000 年我發現中國城市有很多農民工，生活艱苦，在農村留下以億計的留守兒童，又有不少初中畢業的少年女孩出城當勞工，有些淪為陪酒女郎令人心痛。那時蘭州大學請我過去交流，我趁機在甘肅考察農村貧困。之後到北京與中央民政部交流，見部長嚴明復，和他探討少女農民工淪為妓女的問題，他指出關鍵在幫助女孩完成高中教育，又派人帶我到河北的農村了解，我開始深入了解學校及學生的貧困處境。然後到 2001 年，我們籌到一筆兩萬加元的錢，那時候加幣匯率很高，大概有十四萬人民幣，在貧窮地區可資助兩班學生一年所需，於是建立了一團隊，開始了農村扶貧助學工作。至 2022 年，文化更新在加、港、美三地華人團隊已共同幫助超過 21000 人次的孩子完成教育，很多已成為國家的人才。這二十多了我們盡心以無條件的愛對留守兒童，算是我們在這大時代的參與。

我也在實踐中知道中國現實上存在的很多問題，我能真誠而坦率地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議，由於善意和誠懇，官方都能認真聽取並盡可能去解決。由此我也參與了改革大發展，提出過數十個建議。

後來遇到中國社科院的卓新平和北京大學的張志剛教授，我們一起交流和探討，共同提出了「基督教中國化」的研究課題。事實是我幾十年都是努力使基督教能生根中國，與中國文化融通，也跟中國社會實況能夠結合。基督教只有進入中國文化的精神深處，並且用中國思維消化、用中國話語表達，才能中國化，才能在中國裡面生根。這是從神學與文化上的會通，並在三十八年前，我在《會通與轉化》一書，就已提出「非希臘化」，提出「基督教中國化」的說法，我是做了幾十年的研究，找到了從儒道佛轉入基督教的思想通道，伊斯蘭教我也做了研究，理論上也找到溝通之路。

總結文化更新參與貢獻祖國三十多年的實踐和反省，開啓了三條基督教中國化的路：一條學術文化的道路，與利馬竇接近，一條民間草根的大眾關愛扶貧的路，與戴德生接近，一條同中國官方的接觸（反映和建議），與李提摩太接近。結果三條路在中國全都走通了，這可不是基督教中國化了嗎？

這一切發展到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深層融通，就是中華神學的理論建構，我到 2021 年開始下筆，寫下數十年對神學與中國精神的深層反省，構建中華神學的雛型，成為此書。我既是承傳中國歷史文化的學者，也是持守聖經而有靈性體會的中國基督徒，在這中西古今中外大交匯的文化磨蕩與融通中，由十三歲開始讀古書，至今沉思了五十多年。